
当代文学应该如何进行整体性、复杂性书写

——基于“历史化”的一种考察

吴秀明¹

【摘要】：当代文学历史化是建立在对大量的历史性文本合历史合逻辑的理性判断基础之上。它不仅需要做具体切实的知识谱系工作，同时还要对之作立足高远的整体观照和会通融合。而在这方面，整体性、复杂性无疑是其通向幽深层次的两个重要关键词或曰切入点。如何站在史识的高度观照把握“一体”与“异质”相互缠绕的整体历史，在呈现其复杂同时还历史以应有的澄明，这是研究者的一种责任。只有确立整体深邃的分析框架，并给予化繁为简的清晰解读，才能达到对当代文学历史更确当也更为深刻的评判和把握。

【关键词】：整体性 复杂性 历史化

当代文学不断历史化是近些年来显著发生的事实，人们不再满足于把它当作漂泊不定的历史作追踪式的批评，而是也将其视为是一个暂时可以稳定的历史现象进行研究，包括史料收集、整理和研究，有的甚至把它当作一门学问去做。如此这般，这就使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不仅出现了范式转换，而且整体结构及其内涵和品性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呈现为过去所没有的理性恢弘和开阔大气。这一转换和变化也许不尽如人意，人们对此见仁见智，尚有歧义，但就总体而言，它的提出及其实践，包含了对以往过于主观随意的批评化弊端的反思，反映了当代文学要求摆脱附庸，寻求学科独立自强的意识和追求，是值得肯定的。

这里，我不想就历史化的“本体”问题，或曰“如何历史化”问题展开具体探讨，而是主要想强调指出，历史化是有前提条件的，它不可以任性而为。这个前提条件就是对于中国当代七十年来海量般存在的历史性文本，要有一个合历史合逻辑的理性判断。

具体拟围绕整体性、复杂性两个关键词或曰切入点，从这里出发，对当代文学历史进行总结和盘点。大量事实表明，历史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仅需要我们做具体切实而又烦琐细致的知识考古、谱系分类等基础工作，还要对之作立足高远的整体观照和会通融合。只有确立整体深邃的分析框架，并给予化繁为简的清晰解读，才能达到对当代文学历史更确当也更为深刻的评判和把握。而这，在如今的历史化中往往被疏忘或忽略了。所以，有必要引起重视。

一、整体性：面临的挑战与基于时代认知的历史重建

整体性无疑是响彻当代学界最为重要的一个关键词，从 80 年代的“20 世纪中国文学”、“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到 90 年代后的洪子诚的“一体化”、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李杨的“没有十七年及文革，何来新时期”，它与我们的研究如影相随，一直不绝如缕地出现。这也可以说是构成当代文学历史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如果对当代文学的“整体”与“整体”的当代文学缺乏判断和把握，那么不仅无法历史化，而且极易使之滑向偏至，当然也就谈不上有效的历史化了。

樊骏在谈及“史识”应成为衡量史家学术水平和成就的一个“重要依据”时指出：“所谓‘史识’，自然不局限于史家对一些问题逐个地提出怎样的具体见解，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如何从整体性上认识把握所研究的那段文学的全局，如何梳理历史进

¹作者简介：吴秀明，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 31005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及其主要路径与方法”（15AZW009）的阶段性生活成果

程的主要轨迹和线索，如何概括其中的客观规律和如何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等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上所提出、所形成的自己的观点；它不仅用来指导并贯穿于研究的全过程，也体现在所得出的各个结论之中。所以，也可以说更重要的是指隐蔽于具体论点后面的、对有关的历史具有一贯性和普遍意义的基本观念和态度。”⁽¹⁾这种从“史识”高度来观照和把握整体性，并对其内涵进行全面深刻分析，不仅需要引起重视，而且应成为历史化的一个重要原则，在实践中加以贯彻和实施。

何为整体性？整体性是指对对象进行研究及其历史化所秉持的一种基于整体全局的思维观念和艺术把握的方式，它带有总体性、宏观性、统摄性的特点，并有本雅明所说的凡历史唯物主义都应具有的延续到“当下”的含义。⁽²⁾韦勒克、沃伦认为这是“想象世界”高于“经验世界”的伟大之处，因为后者与前者相比，“通常缺少整体性”。⁽³⁾是故，所以我们说“整体性”中包含着“当下性”，“整体性”是“当下性”的“整体性”，而“当下性”则是“整体性”的“当下性”。它直接切入，而不是外在于社会现实，与我们当下毫不相干。

问题是：今天中国现实的“整体性”，已不是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所讲的相对简单狭隘，作家们也相当自信能够进行把握的古希腊生活。90年代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面对互联网、高铁时代万花筒般的现代生活，人们在瞠目结舌的同时，日益明显地感到已完全无法理解自己身处的环境。任何的历史化都不能“脱离总体来作片面肯定或否定”。

无论是肯定或否定，脱离总体历史即成为片面的抽象的论证。”⁽⁴⁾这样情形，导致了整体性书写的艰难，它使今天学人置比当年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说的旷古以来纷乱复杂还要更纷乱复杂的时代环境⁽⁵⁾，用什么方法超越自身局限，给予高屋建瓴的把握，的确需要一副如拉什迪所说的“上帝的视觉”。

有论者在谈及整体性时，认为它“不能回避以下的诸种难题：其一是现代人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的分裂，古希腊式的自我与世界的同一性分崩离析；其二是世界哲学史上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对于总体性的批判，也即认为差异高于总体的后现代思想的挑战；最后不可回避的是20世纪中国文学曾经拥有的经验教训，宏大叙事如果过于一统，就难免流于僵硬，好在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显现出宏大叙事文学建构与重构的新的可能性，这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经验的积累是分不开的。”⁽⁶⁾这样的分析是很精到的。

不过还不完全。返回到现当代文学“打通”研究的“历史现场”，我们就会发现：现有不少的历史化及其整体性研究，往往通过一个被预设的以五四为基点的“现代文学”来实现的。当代文学所谓的整体性，其实也就是“现代文学”的整体性，严格地说是五四启蒙式的整体性，被纳入这样整体性中的当代文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相当一部分已被当作“异质”或“出轨”的排斥在视域之外，它自己是不具备主体独立性，只是被看成不重要或价值不高的一种“次级”文学的存在。

也就是说，“当代文学”是被“现代文学”的整体性所取代和覆盖，在相当程度上，充当了“现代文学”整体性的附庸。这样，被整体性了的“现当代文学”（或曰“20世纪中国文学”），就不期然而然地抹去了当代文学的许多独特的东西，一种无法用启蒙衍生出来的所谓的统一标准的许多独特的东西。

上述种种，就构成了本文所说的有关整体性研究的前提和背景。显然，这个话题提出的本身，它包含了笔者对当代文学学科独立性认同和尊重之意，同时也在客观上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如何营构既涵盖“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同时又超越“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而与传统的近代（古代）文学接轨的更大的整体性的要求。这无疑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它使当代文学在获得独立和解放的同时，也对研究者形成了“挑战”。

有人在谈及“现代文学”进入90年代以后，就曾尖锐地指出，在这一研究领域中，长期以来被奉为圭臬的启蒙“自主的、自足而完整的主体”，“已经变成一种神话，一种幻觉”⁽⁷⁾，它所刻意追求的整体性似乎走到了尽头，那套概念体系已无法描述当下中国社会文化和文学问题了，在相当程度上耗尽了自己的历史能量，失去了历史化解读的能力。

如果说这样的反思性的概括不无道理的话，那么面对现代文学研究出现的这种状况，当代文学不仅需要认真反思原先所服膺的概念及其恪守的规则，而且更有必要根据学科实际情况作出合历史合逻辑的调整。某种意义上，这也为被捆绑在现代文学门下，当作附庸的当代文学历史化及其整体性的建构提供了一种契机和新的可能性。

对于这样的难题，有的研究者早在一二十年前就意识到了，并提出了批评。如贺桂梅在反思“20 世纪中国文学”为代表的现代性文学史写作范式，充分肯定其意义和价值时，就曾指出它所存在的“以偏概全”的问题。而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论者“忽略了‘当代文学’形成的特定历史语境和文化逻辑，而以‘现代文学’衍生出来的统一‘美学’标准衡量‘当代文学’，因而抹去了‘当代文学’的独特性。”⁽⁸⁾如将“悲剧”作为 20 世纪文学的美感特征，就难以概括解放区及当代文学“前三十年”呈现出来的“力度”“乐观主义”的文学精神。

更不要说王瑶先生对之提出的质疑：“你们讲二十世纪为什么不讲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不讲（或少讲，或至少从消极方面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俄国与俄国的影响。”⁽⁹⁾这一质疑，蕴涵了构成“当代文学”特质的那些基本因素，它只有从文里与文外的“逻辑关联”的角度楔入，才有可能给予道出。贺桂梅此文，初刊于《现代中国》第一辑（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出版），后连同《挪用与重构——80 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现代”·“当代”·“五四”——新文学史写作范式的变迁》《“当代文学”的构造及其合法性依据》等几篇与此有关的文章，收入自己结集的论文集《历史与现实之间》，它超越了单一的现代启蒙立场，写得颇为潇洒大气，显示了一位年轻学者的敏锐，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这前后，还有王富仁、孔范今、余飘、吴炫、谭桂林以及台湾地区的龚鹏程、韩国的全炯俊等不少学者，也都著文对“20 世纪中国文学”发表了商榷意见。他们彼此的观点和角度虽有差异，但都不约而同地将批评的目光，调适到了与文学具有异质同构关系的 20 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尤其是 20 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历史的关注上，从这样的立场出发“知人论世”，对当代文学进行历史化。洪子诚虽未撰文参与讨论，只是在二次座谈时极为简约地指出，他们“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特征的根据基本上是准确的。

当然，舍弃了一些不该舍弃的东西。比如，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就没很好概括进去。”⁽¹⁰⁾从他后来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材料与注释》来看，无论观念、思维、方法等各个方面，的确与之有其较大的区别。这突出表现在，1999 年推出那部文学史著作，花费很大心力、作为学术亮点的 40 年代文学的“转折”（从延安到新中国），而且其所提出并被广泛引用的“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审察”⁽¹¹⁾的学术追求。新世纪在相隔 15 年左右出版的《问题与方法》《材料与注释》两书，因为摆脱了教科书模式，更是紧贴当代，用类似互文、中性和密密箍箍的史料，从制度、经典、资源、方法及其深层精神思想心态人格作细致入微分析的治学风格，这与习见的现代文学研究及其历史化是不一样的。

尤其是《材料与注释》，在谈及周扬“反右”批判冯雪峰、丁玲等人时，通过检查交代等原始材料与注释“互证”所构成的特殊文本，事实上将左翼文学阵营从 30 年代到 50 年代、60 年代的语境并置起来，在一个更大也更有历史纵深感整体性视域中对之进行解读。这也说明在经过一段时间实践之后，当代文学历史化开始摆脱了对现代文学的模仿，有了自主独立的学科追求。

请不要误解，我这样说绝不是宣扬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断裂”，而是说不能简单地用现代文学来代替当代文学，当代文学应该有自己的属性及特点，就像现代文学不能简单照搬古代文学那样。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都是五四以降的“新文学”（相对于五四以前的传统文学而言），它们彼此关系与古代文学关系是不同的，更何况现代文学有关“民主”“科学”“人的文学”等思想观念，至今仍在当代文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和影响。

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而且我也主张，当代文学研究及其历史化惟其时长有限（毕竟只有七十年历史）而又与我们处于同构状态，这在时间上，就更应有布鲁代尔所说的“长时段”至少是“中时段”的整体性意识。这样，它可使我们超越“短时段”带来的狭隘局限，而显得更为宏阔。作为百年文学的两个历史时段，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既有前后相续的连贯性、

一致性，又有异质特质清晰的阶段性的呈现。因此，不分时间、场合和前提，将现代文学整体性及其标准无限延伸，是不合适的，也嫌粗疏。

何以然呢？又何以所以然呢？因为彼时文学所处的整体大环境变了：在 80 年代中后期，当文学走出“文革”不久，还处于峻急的政治化特定语境中，批评和研究渴望从僵硬的政治意识形态重压下解脱出来，这时以“启蒙”为旨归的现代文学研究范式对之还非常有效；而 90 年代以后情况则发生了变化，它要求对以往为我们抛弃、撇清和回避的“左翼文学”及其内含的“社会主义经验”进行检视，作为重要的“遗产”重新纳入视域，但这恰恰又是现代文学这种范式所无法完成的，是它无法承受之重。

因此，这就导致了整体性解读模式的失效。这种失效，在市场化和网络化背景下，其不适和错位就得更突出了，以至出现如张英进所说的“消失的整体性”的现象。⁽¹²⁾当然，这里所谓的“消失的整体性”，只是一种比喻，它指的是在后现代语境下整体性研究尤其是“重构”整体性之难。但是祸兮福所依，没有“消失”，那有“重构”？即是说，问题的关键，不是现代文学整体性有没有“消失”，而是怎样“重构”与当代中国历史及现实尤其是与新的历史语境相契？

这个整体性，如同艾略特在谈当代性时所说的那样，“不只是一个共时体系代替另一个共时体系，而且也是旧的共时体系在新的共时体系中的积淀”⁽¹³⁾，它应该是动态，与时俱进，具有开阔的视野及将文学与社会历史互文解读的能力。只有这样，当代文学才能构建与现代文学有关联但又不尽相同的新的整体性范式，在研究及其历史化过程中获取新的历史动力。

实践也表明，90 年代以后，随着思想文化和学术研究的整体路向的变化，尤其是社会生活新的焦点、症候的进一步凸现，文学研究中的这种强调对外部社会关怀和介入，走出纯文学路子，在中国学界不仅丝毫没有减弱，相反呈现出不断强化的趋势，可以说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已经出现了社会学 / 历史学的转向。

如 2015 年第 6 期《文学评论》刊出的程凯等四人的“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笔谈，它“强调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历史化和社会史的视野，是对‘内部研究’和形式批评的一种回应”，它“对于理解 20 世纪中国文学所包含的社会 / 政治内容，进而对理解 20 世纪历史本身，不无裨益”。⁽¹⁴⁾

有的学者还引用社会家有关城市贫困群体，包括下岗职工、登记失业人员、被拖欠退休金的退休人员等数量庞大乃至触目惊心的统计数据，从文学社会学角度，批评中国文学界没有把这一“严重的历史”装进自己的历史视野，反而以“脱历史”的方式，在自己设定的现代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并由此及彼对周扬当年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意义，作了不同于 80 年代的“再次历史化”的思考。⁽¹⁵⁾

与之相似而又不尽相同，是在堪称数量庞大的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队伍中，尽管不少学人，基于认知、兴趣和学术耐心及其当下整体现实的迷茫，转而舍大求小，关注局部和个我，或满足于表面上的类型化。但这并非批评和研究的全部，我们也不能由之否定和排斥人们对整体书写的渴望和诉求。必须看到，还有一些人尤其是 50 后、60 后一代学人，在默默地坚守，并获取了不俗的成果。

如张清华的论著《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就突破了早期更多以形式技术层面讨论先锋文学的思维理路，着重从先锋文学与启蒙主义 / 存在主义的内在关系，显示了“宽阔的文化研究视野”，和“作为学院知识分子对 20 世纪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准确把握”。后来撰写的有关莫言及其余华、贾平凹、王安忆、张炜、苏童、格非、食指、海子等作家作品论，也富有意味地将其看成是“汉语新文学的一个整体”或“从鲁迅到莫言这样一个谱系”，这样，就“使他的评论能够穿越历史雾霭，发现一个作家和百年中国文学的血肉和情感联系”。⁽¹⁶⁾

还要值得一提的是王晓明，他比张清华出道更早，曾在 90 年代初与研究生一起，在一篇对谈式的《旷野上的废墟——文学

和人文精神的危机》文章中提出了“人文精神的失落”问题⁽¹⁷⁾，已显露超越学科专业界限的开阔视野和深广关怀的人文知识分子的特质。

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资本”的介入，“后现代”文化的浸渗和人文精神的重建，王晓明更坚定了“不为时尚所蔽、更不自隔于现实，坚持批判性思考的品格”⁽¹⁸⁾，把注意力和研究兴趣进而转向到“文化批评”的探讨上，如音乐、绘画、雕塑、广告、杂志、肥皂剧、报纸及媒体的娱乐节目等。这使其研究较之早期的比较纯粹而又专精的艺术审美和精神心理，虽不无泛化，但却更为本真地反映和概括了处于转型之际中国社会文化的整体性貌态，为我们提供了被纯文学研究及其历史化所遮蔽或忽略了的另一个空间，包括当代中国都市文化、消费文化和近现代思想史、文化史及其知识分子精神史等。

后来提出的“新意识形态”，及其有关《中国现代思想文选》《亚洲文化研究读本》《城市的限度》等编著，已远远超出了纯文学的界限，在事实上可从“革命中国”乃至“社会主义”那里找到思想资源和脉络。自然，对它的评判，也只有放在更大的整体性及其时空范畴才有可能作出。这亦说明，整体性书写在当下虽然很难，但却并非无前例可循。

这里关键在于，能否重新焕发思想活力和激发对公共想象。社会文化日趋多元，必将导致当代文学整体性书写愈来愈多样，它原先隐匿的内部歧见也愈来愈突出。因而能否及如何处理“文化与文学”“思想与文学”等问题，将无可回避地摆到了我们的面前。对此，我们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笔者在十几年前曾经说过，中国历史像一条超巨型的浩浩荡荡的长江或黄河，它具有包纳百川的容量和气度。因此，对于当代文学历史叙事，更主张整合，而不提倡非此即彼的“翻案”。⁽¹⁹⁾当代文学历史化是中国历史化的组成部分，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行，所以不能因为沾染了浓重的社会政治而将其从这样大格局中剥离出来，作所谓的纯学术研究，这不可能也没有必要。

不能为了体现自己所谓的精英意识和纯文学观念，将当代曾经经历并且在今天还具有浓重社会政治内涵的文学史简单书写成所谓的“自由”或“民间”文学史。如那样，不仅是对历史的遮蔽，同时也是对历史的轻慢，其学术性恐怕就要大打折扣。特别是作为教材传递给学生的知识谱系，可能会产生历史性的误导。

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应该同时也是“中国研究”。如果过于将思维视野局囿于作家作品，对之作所谓的“纯文学”观照，就会招致研究的封闭与狭隘。刘再复在一次对话中坚持认为，“文学是一种无统治区域，它虽然也积淀着理性，但却没有外在理念、理性的统治，它拒绝任何外在的原则的支配，拒绝‘知识——权力’结构的统治。”

据此，他批评福柯懂历史，却不太懂文学。⁽²⁰⁾这话似乎说得有点绝对。其实，“历史研究越是深入一个个文学事件的内部，在权力关系与文学形象之间就越有一种幽暗难以消除。此幽暗不是来自于抽象的超越性，而是在历史研究的现场具体地发生。当此之时，最重要的选择是，我们不应只是重申有关文学超越性的教条，而应努力将这种幽暗转化为历史叙述的积极因素。”⁽²¹⁾

当然，这种将幽暗转化为积极因素的整体性书写，是须以一定的史学素养为根基。而这对于仅有中文专业学术背景而没有受过专门史学训练的大多数当代文学学者来说，也许勉为其难。所以我们有必要进行知识结构的扩容和调整。在历史化问题上，那种把所有的问题都归之文学，仅仅从单一的文学视角研究思路，也是需要反思的。

而且，我们还要看到，作为历史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实践活动，整体性也有一个如何与研究个体和微观历史相契合的问题。因为，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就实践角度考量，文学研究的整体性是建立在研究个体基础之上，并不惮于向历史的局部、细节乃至差异性开放，它绝不是也不应该将自我封闭起来。

这种自我封闭，在过去的“宏大叙事”也曾有过，是需要反思的。但“反思总体性，（但）并不否定真实与意义的存在；而

且，真实与意义并不是以否定总体性的方式居于总体的外部，而是通过对于总体性的否定之否定来把握。这个逻辑超越了多年来制约当代文学发展的二元对立，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总之，它“不是走向以‘自我’为中心，而是走向重建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或者说，“重建一种新的总体性叙述，一种既是‘普遍’的又是‘具体’的总体性”。⁽²²⁾

二、复杂性：原始景观的还原与学术应有的澄明判断

这里所说的复杂性，当然包含了对原始复杂情景反映的意思，它是原始复杂情景在历史化研究中的投影。同时，也是研究主体观念开放与开放观念的必然结果。因为按照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话语理论，对当代文学进行“历史化的语言分析”，哪怕在被一体化时，当代文学也不可能是某种本质必然的真理性终极话语，而是一个充满矛盾、斗争、悖论、断裂的历史生成和构造的产物。

而依据詹姆逊的元共时性和形式意识形态，来审视处于“过渡时期”的当代文学，那么就会看到这种新的意识形态背后同时伴随着“系统的或结构上的对抗”。⁽²³⁾也就是说，不管当代文学如何一体化，它都不可能如我们所想象那样单一纯粹，而是包含许多与之相悖的“异质”的成分，是“一体”与“异质”的复杂构成。从纵向历时性角度来看，历史既有连续性、同一性的一面，也有顿挫、断裂、犹豫的另一面。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十七年、“文革”十年，就是在80年反对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亦有类似情况。

如果处理不当，它是极易出现被“后见之明”观念抹掉，即“因果率”颠倒的舛错。李建军最近在一篇论述俄罗斯文学传统的文章中提到：在希特勒侵略苏联之后，当然主要是作恶和犯罪，但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生存和对苏联农村的控制，也作出了符合人类经验模式的明智选择，以致有回忆文章说，在德国人占领下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比苏联好。⁽²⁴⁾这也提醒我们，历史是复杂的，我们不仅要关注“可见”的文本，同时还要关注“未见”的文本，尤其是带有异质特点的“未见”的文本。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证实福柯有关启蒙理性神话“用‘求全求同’的虚妄来掩饰和压制多元性、差异性和增殖性”⁽²⁵⁾的批判，可谓洞幽烛微，一语中的。

也因此故，所以我们看到，90年代以后的当代文学研究，不再像80年代那样习惯于从“拨乱反正”和“实事求是”，即从文学体制内反省体制本质这个角度进行考察，而是从历史和人的复杂性、实践的多样性角度展开再叙述，研究对象身上复杂暧昧的内涵普遍得到关注和发掘：一方面，为以前忽略的十七年所隐含的审美和人的元素被发掘，文学与政治冲突的裂缝被揭示，由此引发了十七年文学行情看涨乃至出现“再重评”思潮；另一方面，是从新时期出道并取得较大成就和影响的一些作家作品或现象思潮的发生学的追问中，探寻他们与十七年及“文革”的关系。

前者，如在业内产生广泛影响的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的革命历史小说研究，张均由“制度与人”向“本事”转换，将勘探目光投向社会历史纵深和隐秘深处的研究；而后者，就更多了，从李杨的“没有十七年及文革，何来新时期”开始，李陀、於可训、董之林、程光炜、李杨、陶东风、王晓明、蔡翔、王尧、何平等有为数不少的一批学者，它几乎构成了近二十年来当代文学研究及其历史化的一种新走向。

不同于以往好作政治或道德式的简约主义、断裂式的评判，他们基于对历史与生活复杂性的认知，通过史料的发掘与发掘的史料，不仅如实还原和呈现了“五七”、“知青”（含回乡“知青”）两大创作群体，如王蒙、高晓声、陆文夫、韩少功、王安忆、路遥、贾平凹、莫言、北岛、食指，包括茅盾、老舍、曹禺、沈从文、张爱玲、穆旦等“跨时代”作家，被人为回避或剪裁了的在十七年和“文革”的另一面历史乃至不那么“光彩”的历史，而且还揭示了为他们从前所薄视的十七年和“文革”文学那里寻找源流脉络，指出其“潜在写作”与当时公开发表的“主流文学”并不截然对立，所谓的“异端性”是大可质疑，有的甚至是在“文革”之后出版时添加上去的。王尧甚至在一篇文章中讲，他“是喜欢用‘复杂性’这一概念的，在考察中国当代文学史时也常常探讨‘复杂性’因素存在的状态”，甚至认为在历史化问题上，存在着一个需要引起关注的“偏差、修正与调整的‘循环往复’”的规律性现象。⁽²⁶⁾

当然，在中国当代语境下讲复杂性，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离开文学与政治关系这个历史化主脉进行。文学与政治关系是一个老话题，迄今为止有关这方面文章多矣，本文不想对此过多饶舌。这里，只是根据论旨需要，仅就以下一个问题略述一二：这就是在经过一段不无冲动的“非政治”“去政治”之后，近些年来当代学界逐步认识到文学与政治关系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文学的独立性是相对的，并非是对立物，它们彼此是对话关系，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真正割断与政治的关联。文学所谓的“非政治”“去政治”，其实是一种“神话”，它只是表明你所“非”的或“去”的是你不喜欢的这种政治，而想要的是你所喜欢的另一种政治；而且一味地“非”之或“去”之，弄得不好，可能会带来你意想不到的狭窄，反而给你的历史叙述因人为的“洁化”造成不应有的简单、平面和逼仄，将与政治相关联的文学以及启蒙文学和通俗文学、旧体诗文等遮蔽了，排斥于现代性之外。

不少学者正是从这个思路出发，在充分肯定 80 年代启蒙主义为研究提供新内涵的同时，对被遮蔽了的新文学激进主义即与中国政治革命相联系的一面提出了批评，认为“从这个角度反观毛泽东对‘新文化’的阐释和构想，不得不承认新民主主义论虽然是一种外部理论，但却敏锐地抓住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内在联系”，⁽²⁷⁾并由此及彼，对 80 年代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提出的影响很大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说进行了反思。如程光炜在《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一文中，针对已经被固化了的“双重变奏”理论和标准，指出这种“要么用‘左翼’压抑‘自由’，或再用‘自由’来简化‘左翼’，即把历史的复杂性就那么‘格式化’”的处理方式，不仅“窄化”当代文学历史，显得“十分可疑”，而且也无法来统摄、规训并顺利地到五四和鲁迅的历史轨道上运行，更无法面对和理解其漫长历史中的“社会主义经验”问题。⁽²⁸⁾

另一位 50 后学者董之林，则通过对十七年小说类型的分析，从观念与实践之间的错位楔入，告知我们，尽管激进的政治化、革命化内容是当代文学创作的主旨，“小说家一旦进入写作，就像一种知识的生产，小说随即变成对某种先在理念的增殖、变异或改写。这时的小说家，不论他自觉还是不自觉，都无法从某种单一的政治意识形态角度讲述历史……面对叙事多元构成所形成的张力，采取非此即彼的阐释方法肯定是行不通的。”

她还以《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艳阳天》等作为例，指出“虽然农业合作化运动绝不像小说写的那样理想，但小说艺术成功的经验表明，即使在现代激进观念盛行的年代，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也必然包含仁义礼智信等传统因素，而是传统因素对实现本土现代化也应起到至关重要的推进作用。”就是像《李自成》这样深受阶级斗争理论和农民革命动力说影响的作品，它也有大量出色的明清易代各种矛盾、各派政治势力、各种民情风俗等大容量的“综合”历史与生活的描写，而不仅仅将笔墨局囿于农民起义军与明王朝之间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²⁹⁾

颇有意思的是，钱理群、王富仁、温儒敏等比较推崇现实主义、历史理性，强调学术独立性的年长一辈学者，以及张均、杨庆祥、黄平等受到后现代主义、福柯式的知识考古学、谱系学影响的年轻一代学者，他们彼此思想主张和理论资源虽然有较大的差异，但在近些年来，随着文学生态环境的转换更迭，也都不期然而然地对文学与政治复杂关系有了更为客观和理性的认知。

前者，在经历了 1989 政治转折特别是 90 年代兴起的保守主义之后，又吊诡般地对 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历史作了不同于 80 年代的评价。如“20 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提出者之一的钱理群曾说，他的思想立场就从原来单一的启蒙说，转向对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双重反思”，即“既对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激进思潮持一种批判性的态度，同时也意识到了八十年代对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批评遮蔽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³⁰⁾

因为在他看来，“我们今天与今后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新的现实，新的社会问题、危机与变革，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固守于原有的价值立场、知识观念，以不变应万变，将变化了的现实强行纳入我们已有和固有的理论框架（无论是今天盛行的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内，而需要从新的现实出发，进行新的理论创造。”⁽³¹⁾另一位提出者黄子平也有类似情况，他在对带

有浓厚政治色彩的革命历史进行“质询”时，发现“‘革命历史小说’绝非党史教科书的形象翻版，关注的毋宁是人们在彼时彼地的生死命运以及能够彪炳后世的道德风貌——我们谈论的这些作品，或许正应如此而保存了若干自身的价值”；而在讨论怎么写时，还发现这些“叙事形式本身却可能蕴涵更多的文化传承和解释功能，使我们甚至在文本内部也能看出‘革命历史小说’所置身的历史语境的复杂性。”⁽³²⁾

后者，也就是张均、杨庆祥、黄平等70后、80后的年轻学者，他们虽然没有“文革”甚至没有新时期的亲身经历，但相同的学术背景，也使他们对原来心向往之的启蒙的“再思考”，对一大批政治色彩历史人事的“再解读”，包括对80年代曾“平反”人事的“再解读”，从而使历史观和思维方式方法更健全客观，更具包容性。有人说，50年代后期形成的历史化叙述，过于强调当代文学作为“唯一历史方向”的特征，而80年代历史化叙述则过于强调当代文学生成的“强制性”和“被迫”成分，这种状况到了90年代以后，由于意识形态的松动和整体环境的变化，“使得一种相对复杂化的分析和阐释成为可能”，它可使人们“在更为开阔、复杂的历史视野中来重新面对此前已成定论的问题”。⁽³³⁾我以为，这样的概括是合乎事实的。

需要值得指出的是，随着认识的深化和学术转型，上述出现的这种现象并非少数，在新世纪之后，它已逐渐演化为相当普遍的一种学术思潮，在当代文学研究及其历史化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有的学者甚至还将其当作一种学术旨趣的追求，如刘福春就明确将“还原历史的丰富与复杂”作为撰写《中国新诗编年史》的目的与动因，认为“再现‘复杂’可能要比追求‘真实’更重要也更有意义”。⁽³⁴⁾

孟繁华的有关当下文学批评和研究，则“始终着眼于一种复杂性的辩证展开，在这种辩证的展开中，既呈现问题及问题域的复杂性，同时也呈露自身复杂的主体性”。⁽³⁵⁾而洪子诚的研究呢，他有感于一体化概念被滥用，在后来的有关著述中对此作了调整和修正，强调指出一体化这个概念，“在某些地方很适用，但不是万能的，不能代替对一个时期的文学状况的具体研究”，更不可将它凝固化、纯粹化，事实上在一体化的总体格局下面，“文化‘分层’的现象，不同力量的矛盾冲突并没有消失”。⁽³⁶⁾

曹文轩则从更内在也更隐秘的角度指出，洪子诚高频地使用“复杂性”这个词，让我们看到了其“学术思考的另一种理路”，并认为他的学问正是“诞生在那些复杂之处。在本学科内，他比我们更多地看到了缝隙、层面、转折、拐点，表象之下的杂多、矛盾、背景、后置和幽深处。他尽可能地对所有现象表示理解，不喜欢用泾渭分明的是非观加以性质上的判定，尽量保持叙述上的弹性。他的学术贡献，正在于他看到了简单之下的复杂，并在细致解析这些复杂之后，得出了更为辩证、更为妥当，也更为可靠的看法。”⁽³⁷⁾这表明他们对长期以来盛行的简约化主流历史叙述模式的不满。

也许更值得关注，并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上述有关复杂化的思维理路已开始逐渐由方法进而引向内容层面，对原有不简单平面的阐释框架及其结论起到丰富补充作用。以周扬研究为例，迄今为止，对这位身上凝聚了建国以来文坛明潮暗涌而又执牛耳的历史人物，从1993年李辉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摇荡的秋千——关于周扬的随想》开始，不少文章指出周扬在十七年时期的带有“周期性”规律的摇摆性，即运动中坚定不移地迎合政治，运动结束后又向艺术偏斜——就像“秋千”一样，不断在“仕途的雄心与文化的使命”这两者之间来回摇荡，“在他内心，两者或许有过短暂的统一，更多的时期则是矛盾的。

内心的矛盾，就决定了行为的矛盾、人格的矛盾。”⁽³⁸⁾反映在作为文坛班主的“报告”和“讲话”两种文论话语方式上，“‘报告’传达的是意识形态的规训要求，而‘讲话’则是在反思中流露出自己的真实个性与想法。这两种话语方式都是他一手建构起来的，其背后有着复杂的深层原因，这是政治官员与理论学者的身份冲突使之然，也是现实权力与理想追求之间的目标冲突使之然。”⁽³⁹⁾这样的解读，较之80年代对其所作诸如“毛泽东文艺思想权威捍卫者、阐释者”，或“历次文艺批判运动的组织者、批判者和施害者”之类的定位，似乎更符合事实，也更富意味。

与之相似而又不尽相同，是年轻一代学者对90年代后期出版的“反右”书籍的文化分析，因为将其纳入更为开放开阔也更为复杂化的国家、民间、市场、知识分子解释框架中，它“不但描摹了‘右派’知识分子的心灵秘史，以及他们作为‘文化英雄’走向末路的不无反讽性的命运。更为重要的是，它（她）还通过‘右派’话语的播散，呈现了借用‘右派’记忆进行的现

实政治文化实践”，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⁴⁰⁾这显示了“语言学转向”后，年轻一代学者“批判性”地重返历史现场的努力，从而多侧面、多方位、多层次地展现当代文学历史的“原始景观”。

当然，对复杂性的强调，固然为历史本真的还原准备了条件，但正如真理多走了一步就成谬误一样，如果不加限制地扩张，那也极易使研究迷失于某种神秘和复杂中不能自拔，走向相对主义。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复杂性保持一种澄明的判断与认识。无论如何，这一切毕竟都发生在社会主义中国，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文化想象，对社会主义经验和社会主义想象的一种叙述。事实上，复杂性只是我们认识和解读历史的一种路径，而不是我们追求的目的。

当我们说它复杂性的时候，不仅意味着我们对它的评判，而且蕴含着我们对之解决或解释的承纳。即是说，历史叙述作为一种“事后”研究，它“既要保留作为现象特征的丰富性、具体性、个别性，从而使文学史图景呈现某种模糊状态，又要进行或一定程度的选择、概括，使文学史图景具有一定的清晰度。”⁽⁴¹⁾这也可以说是文学研究及其历史化无法规避的一个悖论。这是其一。其二，复杂性虽然重要，但从实践角度讲，它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恢复和还原历史的真实性呢？这也是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问题。不管我们今天具有多大的在场优势，作怎样的努力，“但既是‘事后’，也就不可能完全回到历史现场，……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历史叙述的简约化。

更为重要的是，如洪子诚先生所说，简约并‘不是只有负面的意义’，尤其是在革命年代简化的观念、思想、情感，会发生巨大的动员作用；就我们所讨论的文学史研究而言，也是以一定程度上简化历史‘为其价值实现的前提与代价的’。”⁽⁴²⁾所以，不应以复杂性不加限制地夸大和滥用。其三，当代文学复杂性叙述，还与近年来兴起和发掘的鱼龙混杂、纷纭繁复的史料有关。

这些史料不仅需要甄别、辨析，有一个去伪存真的问题，即使证实了是真实的，也没必要全部纳入，它还有一个如何选择及其与整体性关系协调的问题。在对过去僵硬的“本质论”“必然说”进行反思同时，也要防止另一种“碎片化”“表象化”的偏至。这也是詹姆逊整体性意义之所在，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需要正视的。

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以为当代文学研究及其历史化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澄明判断”不足的问题：首先，是在讲复杂性时，对十七年和“文革”文学中的“异质”、“异端”或“反抗”性因素有缩小或夸大之嫌。比如说邓拓、廖沫沙、吴晗 60 年代的“三家村”杂文，洪子诚认为它是“政权内部一种比较‘开明’的观点，是另一种思想和政策的反映”，而“不能说成是对当时统治的抗议，尽管姚文元在文革开始时，批判它们是‘反党的’”，主张对十七年这类文学的“偏离程度和性质，应该给予限定，而且要给予分析、说明”。⁽⁴³⁾

当然，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要数 80 年代胡风问题“平反”时，将其夸饰为反体制的“英雄”，而忽略了胡风在整体上努力维护毛泽东文艺思想，只是在个别地方微调，并且按照自己的理解对之作作了重塑的客观事实。说实在的，在当代中国一体化体制之下，并不存在一种所谓的文学文化的“对抗体制”，相反，如美国学者彼得·伯格所说，对于后者的有效清除，正是社会主义国家文化体制的基本功能。⁽⁴⁴⁾其次，是有些学者基于某种所谓的“中性立场”，也囿于理性知解力的薄弱，在对研究对象还原和转换时，往往为自己搜集占有的丰富复杂的材料所惑。

这时候，他对历史的复杂言说反而给历史化带来了不应有的戕害。比如一段时期以来，有学人挖掘“鞍钢宪法”中的积极价值，然而历史学家高华通过考证告知我们：“‘大跃进’期间的鞍钢工人没有争取‘经济民主’的思想意识‘两参一改三结合’与‘经济民主’不搭界，所谓‘经济民主’只是当今学人理念世界的产物，与当年鞍钢工人无涉。”⁽⁴⁵⁾这种按照自己预设立场煞费苦心地收集史料，以某种理想化的态度来构筑过去的作法，还可举出不少。

又如刚才提及的有关周扬的“周期性”摇摆的解读，它的确给人带来一些新鲜的洞见，并且是有一定的史实依据的，但随意挪用或奢谈，这就不仅以偏概全，而且也存在着将历史人物的连续性与整体性人为切断的危险。实际上，正如后来有研究者

所说，真实的周扬及其这一代人始终是“一元”的（“一元的周扬”），即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也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所谓的“摇荡的秋千”，或“在政治与艺术之间的痛苦抉择与摇摆”等有关描述，更像是一种形象性的比喻，并不真正的、完全地适用于他们，从一定意义上，它只是90年代知识分子日益远离政治与意识形态中心，并向职业化与学院化方向发展的背景下的一种“自我想象”。⁽⁴⁶⁾

三、结语

在对当代文学整体性和复杂性进行如上历史化反思的最后，有必要补充与说明二点，作为结语：首先，本文所说的整体性，是建立在对当代文学学科属性基础之上。这一点，我们在前面讲“当代”与“现代”关系时曾有论述，它涉及整体性研究在“打通”或曰“汇通”各学科界限同时带来的“取消属性差异”的局限性问题。众所周知，“断裂性”与“汇通性”是迄今为止文学研究及其历史化的两条主要路径：前者，倾向于在时间之流中标记出某个界碑，以确认其文学新质；后者，则体现在消解在时间之流中的鲜明转折性，使历史成为一个连续性的整体。以往文学历史化基本都遵循“断裂性”思路，以凸现自己更具优先性的新质。

而“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没有十七年及文革，何来新时期”以及我们这里所说的整体性，则都属于“弥补断裂”的“汇通性”概念。它有自己的优势，在现在的提出，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但这种汇通的暧昧性同样如影随形。像王德威主编的哈佛版《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将“现代”汇通到1635年晚明，从那里起始，一直延续到当代作家韩松所幻想的2066年“火星照耀美国”，在这样自古至今，并通向未来的长度中讲整体性即“汇通性”，当然是有“争议”的，它的实践，“也必面临着不断重写的暧昧性”。⁽⁴⁷⁾青年学者陈培浩的分析和质疑，是很有道理的。这也昭示我们，整体性固然重要，但它与历史化的任何路径和方法一样，同样也是需要不断反思和调整的，不能作固化的、本质主义的理解。

其次，是在讲复杂性及其对历史人事进行复杂叙述时，不能将眼光仅仅停留在外在表象上，而应努力确立一种整体会通的逻辑框架，保持学术研究应有的价值指向、思考向度和化约能力，使之具有研究应有的澄明和清晰度。也是曹文轩，他在高度赞肯洪子诚对当代文学复杂叙述的最后，不忘提醒我们：不要“将他的这一路神圣化、格式化”，文学史也可像夏志清那样，“可以写成一部明确强调文学价值的文学史”。他还特别指出，洪子诚成就的取得与陈晓明、张颐武、戴锦华这些同事兼同行学者有关，“如果没有他们这些学者为你创造了一个丰富而深邃的理论语境，你的学问大概也难做到这个制高点上”。⁽⁴⁸⁾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应当站在更加开阔，包括从与理论联系的高度，来看待当代文学的复杂性问题。随着观念更加多元开放，随着大量新史料的发现，可以预料，当代文学历史化中的复杂性叙述的澄明判断问题将愈加突出。因此，如何处理一元论历史框架与多元史料之间的关系，清理文学内部的杂质与污浊，给研究以清明的秩序，这将成为当下及今后历史化的一个无容回避的问题。它需要人们既有洞幽烛微的眼光，又有化繁为简的能力，还有一以贯之的价值观。总之，对研究者的理论思维和综合学养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更高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复杂性只是历史的一个面向，一种呈现的方式而非全部，并且是有陷阱的，我们不能将其无限夸大，否则很有可能在还原过程中迷失了方向。

注释：

1 樊骏：《唐弢的现代文学研究》，参见陈平原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4页。

2 本雅明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能没有‘当下’的概念。这个当下不是一个过渡阶段……这个当下界定了他书写历史的现实语境。历史主义给予过去一个‘永恒’的意象；而历史唯有则为此过去提供了独特的体验。”参见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载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阳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74页。

3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39～240页。

4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走向未来》1986年创刊号。

5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写过一句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种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某种意义上，我们现在面临着的，也是这样一种狄更斯所描述的时代环境。

6 黄平：《“总体性”难题——以李敬泽〈会饮记〉为中心》，《文学评论》2019年第2期。

7(36)(43)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5、88、87页。

8 贺桂梅：《历史与现实之间》，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49页。

9 钱理群：《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10 陈平原、黄子平：《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两次座谈》，《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5期。

11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2 张英进：《历史整体性的消失与重构——中西方文学史的编撰与现当代中国文学》，《文艺争鸣》2010年第1期。

13 托·斯·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曹庸译，《外国文艺》1980年第3期。

14 《“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笔谈》编者按，《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

15 参见程光炜《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9～64页。

16 孟繁华：《他还是一个有趣的浪漫文人》，《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6期。

17 王晓明等：《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

18 王晓明主编：《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

19 吴秀明：《论文化转型语境中的“历史翻案”现象——兼谈当前历史文学的历史观和艺术创造力问题》，《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5期。

20 王晓明主编：《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

21 汤拥华：《重构文学性：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一个理论问题》，《扬之江评论》2015年第6期。

22 黄平：《“总体性”难题——以李敬泽〈会饮记〉为中心》，《文学评论》2019年第2期。

-
- 23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7 页。
- 24 参见李建军《对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完美接续》，《当代文坛》2019 年第 3 期。
- 25 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余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 26 王尧：《偏差、修正与调整的“循环往复”——关于 20 世纪 50、60 年代文学制度的一种考察》，《文艺研究》2014 年第 2 期。
- 27 季剑青：《什么是“现代文学”的“现代”？——中国现代文学起点问题的历史考察和再思考》，《文学评论》2015 年第 4 期。
- 28 程光炜：《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文艺研究》2008 年第 4 期。
- 29 董之林、叶立文：《视角改变世界——董之林先生访谈录》，《新文学评论》2014 年第 4 期。
- 30 李云雷：《钱理群的“双重反思”》，《读书》2008 年第 12 期。
- 31 钱理群：《二十六篇：和青年朋友谈心·我与青年（代序）》，东方出版中心 2018 年版，第 21～22 页。
- 32 李春：《从“前缘”到“边缘”——黄子平的批评踪迹》，转引自陈平原主编《学术史：课程与作业》，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93 页。
- 33 贺桂梅：《历史与现实之间》，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89 页。
- 34 刘福春：《还原历史的丰富与复杂》，《文学评论》2014 年第 3 期。
- 35 唐伟：《只有理解现在，才能解释过去——关于〈文学革命终结之后——新世纪文学论稿〉》，《南方文坛》2014 年第 3 期。
- 36 曹文轩：《一个人与一个学科》，《中华读书报》2010 年 2 月 24 日。
- 37 李辉：《摇荡的秋千——关于周扬的随想》，《读书》1993 年第 10 期。
- 38 许丽、刘锋杰：《“报告”与“讲话”：周扬“十七年”文论话语的建构与冲突》，《文艺争鸣》2014 年第 3 期。
- 39 刘复生：《穿着语言，图绘历史——解读贺桂梅》，《南方文坛》2005 年第 4 期。
- 40 钱理群：《我的文学史研究》，引自钱理群《历史书写的化约问题与恢复复杂性、丰富性的可能性——读洪子诚先生〈材料与注释〉》，《文艺争鸣》2017 年第 3 期。
- 41 钱理群：《历史书写的化约问题与恢复复杂性、丰富性的可能性——读洪子诚先生〈材料与注释〉》，《文艺争鸣》2017 年第 3 期。

42 参见彼得·伯格《文学体制与现代化》，《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43 高华：《鞍钢工人与“鞍钢宪法”》，《二十一世纪》2000年4月号（总第58期）。

44 参见李倩《周扬复出后文艺思想论》，《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2期。

45 陈培浩：《“历史化”与文学史学科命名论争——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民国文学”为中心》，载《“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化问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主办，2019年3月。

46 曹文轩：《一个人与一个学科》，《中华读书报》2010年2月24日。